

# 我和李——我为何在信仰法轮功十年后离开

<https://ben-d-hurley.medium.com/-10677166298b>

\*我大约三年前写了这个故事，当时我决定不再与法轮功冥想团体有任何关系。我花了一些时间才鼓起勇气发表它。如果某些参考资料有点过时，我深表歉意。我在这个博客上发表了小说，但想澄清这篇文章是完全真实的，除了我删除的人名。

法轮功学员正在表演第五套功法。来源：明慧网

我想是林恩\*的死最终让我意识到是时候离开了。大约一年前，当我在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信徒一年一度的“法会”上见到她时，我就看到了不祥之兆，他们互相交流经验，共同精神成长。我是昆士兰一家估价公司的行政助理，多年来，我在各种活动中认识了她，她是一位热情而冷静的女士，有时间照顾每个人。但我注意到她头的一侧出现了一个凸起，当我和她说话时我试图不去看它。我在她的笑容中看到了，或者至少我相信我看到了一些痛苦。她大概在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执着”没有放下，导致了这种病蔓延到全身，危及她的生命。我本想告诉她去医院，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决心去逐渐恢复逻辑。我内心的另一部分担心，通过看到它，我就承认了这一点——在法轮功中，你不会对疾病这样做，因为李洪志大师教导他的学生不会生病。他可以治愈你，但前提是你对他和他的教义的信仰没有任何漏洞。李说，一些拥有坚定信念的人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周围其他人的思想缺陷而死亡。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只要想法错误就很危险。我内心的另一部分担心，通过看到它，我就承认了这一点——在法轮功中，你不会对疾病这样做，因为李洪志大师教导他的学生不会生病。他可以治愈你，但前提是你对他和他的教义的信仰没有任何漏洞。李说，一些拥有坚定信念的人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周围其他人的思想缺陷而死亡。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只要想法错误就很危险。

后来我从小道消息中听说了林恩的死讯。癌症进入了她的大脑，她在极度痛苦中去世，可能一直认为自己陷入了这种可怕的困境是她的错。在某种程度上，我想是的。

她并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因拒绝治疗而病死的法轮功学员。另一位名叫莎拉\*，曾在悉尼为我母亲做过一段时间的园艺工作。她和我妈妈相处得很好，花园也做得很好，直到她的乳腺癌变得太严重。作为一名坚定的信徒，她在澳大利亚法轮功组织中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自由中国主席和天国乐团发言人。她拒绝接受治疗，最终为时已晚而接受治疗。她这些天不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而是在一个修炼者家庭的客厅里度过的，她无法或不愿意向外界解释为什么她没有寻求专业帮助。她最后的欢呼之一是在法轮功活动中唱歌，坐在舞台上的轮椅上。我听了一段录音，音乐欢快且充满希望。我默默地哀悼着她的去世，拨通了她的手机，听了最后一遍她的回信息，她平静而舒缓的声音，然后删除了她的联系方式。我从未告诉我的妻子或朋友她死亡的真相。

法轮功学员经常死于可治疗的疾病，这是法轮功最肮脏的秘密之一。很多法轮功学员就这样死去了。当我参与社区活动时，我经常听到死亡的消息，通常是中年或老年从业者死于他们未治疗的癌症。这些案例会在小组“分享”中出现，我们会定期聚会，一起研读经文，然后讨论它们。他们会出现在我所在的电子邮件列表中。通常都是要求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排除邪恶干扰”，才导致这个人得病。后来有消息悄悄传开，说这个人没有成功。

这是中国政府对法轮功最早的批评之一——数千名法轮功信徒因为拒绝接受可治疗的医疗帮助而死亡。随后，中国政府对自焚、谋杀和恐怖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更可疑的指控，为其针对该组织的残酷行动辩护——这一行动一直持续至今，已造成数千人死亡。法轮功学员不断反驳说，这些说法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宣传。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解释李洪志大师非常明确的不吃药的教诲。事实上，党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我不相信他们的数字。甚至在2015年5月法轮功网站明慧网上发表的最近一次讲座中，

病业检验的事例已经不少了，甚至有很多人去世了。但说实话，说实话，从表面上看不出一个修炼者到底是怎样的。当然，这样的人也会像别人一样做大法的事，但人看到的是表面的东西，而实际上内心深处有很多执着，别人是看不到的。（访问日期：2016年1月16日）

我可以自信地说，任何接触法轮功时间较长的人都会听说过或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案例。但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话题，即使房间里只有练习者，也会感到不舒服。任何信仰法轮功的人都会向非信徒隐瞒这个秘

密。他们隐藏它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朋友和家人知道他们有多么奇怪的信仰。他们真诚地担心，通过揭露它，他们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并让他们下地狱。

许多医学专业人士实际上都知道这一点，但由于某种原因，它在西方世界逃脱了更广泛的公众监督。也许中国共产党和法轮功之间的激烈争论已经淹没了双方关于半真半假的更细致的讨论。我曾经遇到一位护士，她亲眼目睹了一位垂死的法轮功学员在医院拒绝用药。不久前，当我就包括这个在内的几个话题寻求咨询时，结果发现我的辅导员是台湾人，就这样失去了一位阿姨。她在没有接受姑息治疗的情况下与癌症走到了最后。

法轮功主宰了我生命的十年。事情始于悉尼中央商务区一位中国男子的传单，其中概述了这种做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并谈到了中国的情况。我回家继续阅读。我决定参加当地的一个冥想场所，每天早上 5 点到 7 点进行冥想，地点在离我住处仅一个街区的一个公园里，在两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下俯瞰格利伯的布莱克瓦特尔湾 (Blackwattle Bay)。教我功法的人很友好、有趣而且不引人注目。没有金钱交换，而且材料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在其中，我看到了我渴望已久的精神指引，似乎没有让我对许多宗教产生排斥的福音派、超凡魅力的倾向。事实证明，我在这些观点上错了，但我想当这些方面变得明显时，我已经非常专注于教义了。每个修炼者弘扬法轮功所需要的巨大工作量，在《转法轮》正本中并没有真正讲到，而是在李老师后来的文章中逐渐揭晓。

我强迫自己坚持炼功，最终能够盘腿坐整整一个小时——这是法轮功功法教程中要求的时间长度。不幸的是，几年后，那些最初教我练习的人要么不再练习，要么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相信，但被社区所回避。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旅行中融入了泰国的法轮功学员群体，从而加深了我的信仰。我们会一起在曼谷的隆比尼公园锻炼身体，吃一些美味的食物，然后一些人去上班，另一些人留下来看一会儿书。

阅读小组通常在晚上在某人的客厅里举行，在早期的日子里特别温暖。我会挤在一个房间里，里面挤满了中国大陆人、泰国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我们轮流用各种语言大声朗读法轮功教义中的段落，而其他成员则用自己的语言朗读。之后我们会聊一两个小时，谈论我们的生活和面临的问题。

但也许我在这里戴着有色眼镜。当我回到澳大利亚时，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的改变感到惊讶。我很热心，很热衷于传福音，并将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法轮功活动中。我以前对世界所提供的许多体验的好奇兴趣已经消失了。我的社会信仰已经从典型的左倾家庭的信仰转变为非常保守的色彩。在人们不情愿地接受新的我之前，我需要做很多解释。后来我观察到其他新法轮功学员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他们一开始会对家人的突然改变感到震惊，然后逐渐学会过大多数修炼者典型的双重生活。许多人会找到正常的工作。

在我修炼法轮功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法轮功的公共宣传项目，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对《大纪元时报》的贡献。法轮功修炼者创办了一系列媒体公司，作为他们视为精神使命的一部分，包括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和《视觉中国时报》。他们的目的纯粹是福音派的，尽管可能不是福音派基督徒所理解的方式。让人们皈依法轮功不是现在的首要任务——根据李师父的教诲，这将在未来发生——在世界末日发生“淘汰”之后，任何对法轮功抱有不好想法或对中国人抱有好想法的人都会被淘汰。共产党，必有悲惨的结局。

（明慧网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一天的非常生动的描述，其中修炼者描述了李师父给他们的人们被淘汰的景象。“人们在恐惧中尖叫，”其中写道[最后访问 2017 年 10 月 23 日]。“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尸体。接下来，地面裂开。怪物正在攻击人类。”接下来描述了幸存者感谢大法饶恕了他们。）

因此，法轮功所有项目的精神使命是一种大规模的公关活动，让人们对法轮功产生热情，但不一定要改变他们的信仰，让人们远离共产党——这是人类世界中真正存在的一切的代表。宇宙中的邪恶。这种意图在这些媒体上与这些话题相关的任何文章中都很明显，无论是克里斯·查佩尔 (Chris Chappell) 的《未经审查的中国》的讽刺戏谑，还是《大纪元时报》更为硬朗的严肃新闻报道。

《大纪元澳大利亚》英文版是在一对法轮功夫夫妇的夏山小客厅里开始出版的，一群追随者坐在地板上用笔记本电脑拼凑起来。不知怎的，我们这些乌合之众的军队几乎没有任何媒体经验，却设法以这种方式出版了一份周报。后来，英文版与更成功的中文版报纸一起在赫斯特维尔 (Hurstville) 火车轨道旁的楼上办公室中发表，赫斯特维尔是悉尼南部华人占主导地位的郊区。一些第一版有一些可笑的错误。但考虑到资源匮乏，其他人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不知道每周印刷数千份报纸的钱从哪里来，或者支付路透社和美国联合通讯社的文章费用。更不用说支付另一家媒体公司——新唐人电视台——一家卫星电视台的费用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大使馆当时特别积极地寻找和施压法轮功的公众支持者。有

人告诉我这是一些富有的捐助者。一些法轮功批评者认为它来自美国政府。老实说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大纪元时报》的编辑方针非常明确地表示同情美国政府。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在报纸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我们经常熬夜并进行红眼争论。但也有温暖和友情，特别是在厨房里，志愿者为团队做饭和泡茶。

享有声望的编辑职位是一次可疑的晋升。基本上就是为了大纪元放弃一生，这就是时间的承诺。没有时间工作、谈恋爱或养家糊口，编辑通常是一个靠自己积蓄生活的单身人士。一位编辑是一个性格热情、温柔的人，他成为了我的好朋友。他设法担任这个职位几年，我直接看到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他只是一直很累。有一次，当时的澳大利亚《大纪元时报》负责人决定开始向他支付非常基本的工资来满足他的生活费用。后来李老师直接介入，裁定不能用其他学员自愿捐的钱给大纪元工作人员发工资。我的朋友突然负债累累，并必须偿还他所收到的款项，而这笔钱总计是他所没有的一大笔钱。不知何故，他的信念仍然存在，尽管在他为报纸付出了所有的汗水和鲜血之后，他的脸被打了一记耳光。几年后，法轮功媒体公司的员工又可以领取基本工资来开展工作。像这样的单方面决定是毫无疑问、不容挑战的。天堂已经说话了。继续追随法轮功意味着对我的自由意志、我的独立逻辑的缓慢的千刀万剐。就像李老师的考验，筛选温和派，巩固狂热分子。几年后，法轮功媒体公司的员工又可以领取基本工资来开展工作。像这样的单方面决定是毫无疑问、不容挑战的。天堂已经说话了。继续追随法轮功意味着对我的自由意志、我的独立逻辑的缓慢的千刀万剐。就像李老师的考验，筛选温和派，巩固狂热分子。

纸上竟然全是李大师的指纹。有一次，李老师直接解雇了一大批法轮功媒体人员，并任命新人接替他们。但他的大部分影响力是通过少数精选的亲密追随者实现的，他们随后通过更广泛的法轮功网络传达他的指示。很少有人清楚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也不清楚这实际上是李大师的指示，还是仅仅是纽约大纪元董事会的决定。这通常被描述为纽约的决定。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法轮功的教条压倒了公众的知情权。澳大利亚《大纪元时报》成立之初，我们是在与纽约总社召开电话会议后制定了编辑守则。它明确规定，对于正面评价法轮功的公众人物，要正面报道，如果涉及丑闻，则避免负面报道。我们还应该避免正面报道那些曾说过法轮功坏话或被认为与中国政府关系过于密切的人。后来，当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我们并没有质疑美国的参与。我们要完全避免报道任何与同性恋有关的事情。还有一些我们绝对不会涵盖的特定人群。其中之一是希拉里·克林顿，她被视为向中国政府出卖了自己。还有一个是时任联合国主席科菲·安南，这和他在另外空间是鬼或魔鬼有关。成龙和电影导演张艺谋也同样被视为已经出卖了共产党。由于此类指令的高度可变性，以及我现在与该组织的距离，我不能说它们今天是否仍然有效。

一封电子邮件通告尤其让我热血沸腾。它向全球所有大纪元员工指示了他们应该如何向公众或他们的朋友或家人描述大纪元。我们不能透露自己是志愿者，因为这会给报纸留下不专业的印象。我们也不要大纪元和法轮功联系起来。相反，我们应该将自己描述为工作人员，并且有人建议我们如何回答有关我们是否获得报酬的问题，同时仍然坚持法轮功的“真理”教义。我为此写了一封愤怒的电子邮件，并引发了一场电子邮件争议——这不是我的第一次，也不是我的最后一次。他们怎么敢告诉我应该如何向我的朋友和家人描述我所参与的事情？为什么有必要否认法轮功及其媒体机构之间的联系？例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已经表明，一个有时会引起争议的宗教团体有可能公开经营一份受人尊敬的媒体出版物。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社会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是令人惊讶的开放。

后来又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大纪元的每一位员工都要参加总社开发的详尽的语法和写作课程。对于一个已经超负荷工作（而且大部分没有报酬）的团队来说，这是几周的工作。它教授的语法水平对于大多数媒体专业人士来说都是多余的，除了副编辑之外。你已经拥有多少媒体经验或你有多少时间都无关紧要。这是一种“一体”的练习，用法轮功的话说，每个信徒的思想和行动都一致。实际成果（或缺乏实际成果）让位于我们通过此类行动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化。

我从未针对这些指示提出的一个论点可能是：当我免费为你提供这么多时间并且不求任何回报时，你怎么敢向我发号施令？但我知道这会被置若罔闻。我们所有人都以“德”为报酬——一种在另一个维度的白色物质，当你做好事时你会获得这种物质，并带来今生和来世的祝福。我们都将获得美好的未来。我们都深信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内容的控制变得越来越详细和铁定。这一点在神韵舞蹈团的报道文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该舞蹈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并在纽约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和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等一些高级场馆演出。就为永生祈福而言，参加神韵报道队已经是最好的了。神韵的每一场演出都被法轮功学员视为

另外空间的善恶之战，而在物质空间的表现则显得更加平凡。媒体团队将在会场附近的酒店房间或公寓集合，准备通宵工作。中场休息和演出结束后，几名记者会前往会场对观众进行简短采访。正面的评论被记录下来或录制成视频，然后迅速写成文章并在法轮功各媒体上播出。每个商店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这些标准大概是直接来自李师傅的。大纪元必须在每场演出结束后的半小时内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否则异空间的战斗一晚上基本就输了，神韵整个中国巡演都将受到影响。每天晚上必须写的文章也有一定的限额，而且每年都在增加。高优先级的人首先被写下来——在社会上知名或受人尊敬的人——剩下的人连夜写下来。

每当神韵来到镇上时，都会有另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宇宙战方面的事情。这支队伍坐在附近的一个房间里，盘腿，右手举在胸前，日夜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有全职工作的人会在下班后顺便来一两个小时，其他人会待更长时间，日复一日地连续几个小时来。当地的“辅导中心”，基本上是法轮功中央组织在每个城市的卫星办公室，也会规定所有该市的法轮功练习者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发正念 15 分钟——通常是每晚 3 次。这是除了已经存在多年的四个全球时间之外，

每年我都会害怕神韵来到澳大利亚，因为预计那里的所有学员基本上都会在神韵到来之前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搁置自己的生活，以满足所有这些要求。我越来越生气，法轮功学员本来已经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却花那么多时间坐在房间里发正念，而不是做一些有实际效果的活动。我希望李老师最终能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对此提出一些理由，果然在 2011 年 7 月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演讲中他确实谈到了这个问题。据李老师说，问题在于像我这样的人：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学员集体发正念……清除邪恶当然是好事。那么多人发正念还起不了作用吗？它确实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们要看看有的人发正念时发出的是什么。他坐在那里，手心直立，但他的思想不正：“今年怎么采取这样的做法？去年我卖票做得很好。我可以出去卖票，为什么还要让我在这里发正念呢？为什么要针对社会主流文化？这些票这么贵，谁会买？！”（笑声）虽然现在听到这个听起来很有趣，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发出去之后，在全世界都变成了一种粘稠的、像胶水一样的物质，只要有极少数的邪恶生命就能够干扰你。这不是你能清除的，它直接堵住了我们大法弟子的售票，堵住了发真正念的大法弟子。

换句话说，那些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并且在这样做时心生怨恨的人才是问题所在。那天我的信仰又消失了。我们谈论的是每 24 小时累计 100 分钟的时间，此外还有几个小时的读经和冥想，这对于任何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每个法轮功修炼者都负有参与其中的各种项目。已经无法睡个好觉了，与社会维持正常的关系也越来越困难。我内心深处那个喋喋不休的声音变得更强烈了——李老师就是想让我们都忙起来，累起来。

当我参与这些媒体项目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在社会上获得真正的吸引力是多么困难。由于无法将救人的精神使命托付给非信徒，也不愿意让外人了解法轮功的阴谋，这些媒体无能为力，只能不断地从极少数法轮功学员中汲取教训，而这些人通常对法轮功学员的了解很少。或者没有媒体经验。无论他们制作出多么好的内容（我仍然觉得神韵舞蹈很漂亮，原来的管弦乐也很可爱），它都被贯穿始终的法轮功宣传的真正怪异以及那些被迫害的修炼者本身的古怪所掩盖。法轮功团体之外的社会关系很少。以群组分享为例，

我并不是要把法轮功说成是一个僵化的独裁政权。像上面这样的一些决定是在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助理会议上做出的，尽管参加这些会议意味着我要放弃每周本已稀缺的额外时间，并忍受经常弥漫在他们身上的内疚之旅，因为练习者做得不够好，所以世界上许多人都注定要失败。

但很多人来自上级，限制和时间要求也越来越铁。李老师的权威始终存在——难以捉摸、不断变化、不容挑战。

这种控制延伸到了更广泛的法轮功群体的个人生活中，渐渐地，我因为没有按照要求的程度参与而被排除在群体之外。

当我参与法轮功时，整个国际社会两次被告知要换手机。第一次发生是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修炼者在手机上收到反法轮功的宣传信息之后。我们被告知，中国特勤局知道我们所有的号码，并且可以随时监听我们的情况。如果我们同时更改号码，我们就会破坏他们的数据库。

我第一次这样做，并经历了告诉所有朋友和联系我的新手机号码的不便。大约一年后，我们被指示再次做同样的事情，这次我拒绝了。它是我的工作号码的两倍，改变它实在是太麻烦了。有人告诉我，没问题，只需携带两部手机即可——一部用于与日常生活打交道，一部用于与法轮功学员打交道。更不用说

裤子里经常有两部手机的重量和费用，这对我来说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法轮功之前一直将自己宣传为一个透明、开放的团体，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然，那些在中国与法轮功学员交流的人应该注意安全，因为那些人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威胁和逮捕……但是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吗？我到底有什么必要隐瞒的？由于拒绝更换号码，我不再欢迎同修拨打新号码，大部分沟通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我的一些法轮功学员朋友甚至对我采取了这种严格的政策，使我们很难赶上。

集体更换手机似乎有些极端，但正如在法轮功的许多领域一样，这一决定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确实，在法轮功活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面色严肃的中国男子拿着摄像机跟着我们，监视我们的活动。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常常会愤怒地反应或逃跑。我母亲曾经接到一个中国女人的电话，让她阻止我修炼法轮功——她是谁？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家的电话号码的？然后学员的手机上就一下子出现了宣传信息。当然，还有对前中国外交官陈用林等中国政府叛逃者进行广泛监控的指控。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及其驻外使馆正在监视法轮功的活动，但无法说出监视程度。不确定性滋生恐惧、困惑和狂热。

我被淘汰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年各个城市和国家举办的“经验分享会议”变得越来越难参加，而不仅仅是因为座位已满。为了获得参加门票，您当地的助理必须证明您是一位勤奋的修行者，经常参加小组阅读和分享。我非常忙于公司工作和照顾患有退行性疾病的母亲。我发现很多这样的共享都是非结构化的、低效的，并且浪费了大量本已稀缺的时间。每周参加的会议少于一次使我很难参加这些会议，因为我被认为不够勤奋。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意了，但它确实向我展示了法轮功在向一个孤立的、控制性的团体转变方面已经走了多远，该团体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日益将其成员与社会隔离，并隐藏其内部运作以逃避外界的监督。在我接触法轮功的最初几年，这些法会向任何人开放，无论他们是否修炼，为任何想要的人提供了对法轮功的透明、真实的了解。

法轮功越来越接近成为一个等级制度日益严格的结构化组织。在2010年7月的一篇题为《更加精进》的文章中，李洪志提出了一项新指示，即任何人都不得挑战上级的决定——无论是项目负责人还是法轮功组织中的负责人——这颠覆了之前的规定。松散且很大程度上民主的组织结构。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每个项目的主要协调员——一位首席协调员——就是该项目的代表。各地佛学会的主要协调员也是如此。他或她是其代表。无论协调员做什么、要求你做什么或决定什么——无条件地执行。（热烈鼓掌）从今天开始。

法轮功在许多其他方面也发生了转变。起初，这个团体并不反对其他主要宗教的有效性，但后来李大师断言，掌管其他宗教的诸神已经变得邪恶，正在干扰他的宇宙使命。他还规定了与中国民主倡导者等社会团体的交往规则，法轮功学员由于共同反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而与这些团体有一些交往。在他2007年发布的经过精心编辑的视频讲座《向澳大利亚修炼者传法》中，他斥责他的追随者像孩子一样向普通人敞开心扉并分享他们的问题。“普通人很难理解我们，”他说。

然后就是时间承诺变得越来越难兑现。我之前说过，世界各地的学员每天必须发正念四次，每次15分钟，分别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中午12点、下午6点和中午12点。这意味着每天晚上都要凌晨两点起床，这扰乱了我本来就不足的睡眠。事实上，多年来我每晚的睡眠时间一直在五个小时左右，甚至经常更少。李大师还经常对他过去的作品进行修改——常常只是简单地将几个字符改为其他含义略有不同的字符。把这样的神圣文本扔进垃圾里是不可以的，所以修行者需要一页一页地翻阅他们的书，并用刀片刮掉现在不正确的字符，然后将新的字符粘在上面。一本300多页的书里有数百个字符的变化意味着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作时间。这是另一个不切实际且耗时的指令，我们本应在精神上成长。

除了不喝酒、不杀生等官方戒律之外，还有一系列非官方戒律不断增加。我们必须吃完盘子里的所有食物，否则我们死后就得把它们当作腐烂的食物吃掉。我们不应该吃生鱼片之类的生肉，因为那会导致怨恨的生物体在我们的胃里积聚。我们不应该吃释迦，因为它们的形状像佛头。

总而言之，这几乎排除了为了做事而做事的可能性，而这正是世界上许多创造力的来源。当时间和精力如此紧张时，爱好、锻炼、阅读、旅行——所有这些都变得难以合理。当我开始逐渐远离法轮功并开始重新提起这些事情时，我与很多个人愧疚作斗争，不敢向其他法轮功学员谈论这些事情。这种无辜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它浪费了所有法轮功学员应该做的“三件事”——学经、洪法、发正念的时间。李说，与某人的每一次互动，即使只是在街上偶然遇到一个陌生人，都是谈论法轮功的机会。

很难说李大师是否达到了他对修炼者的高标准。一位离开该团体的学员威廉\*前往山上亲眼见到了李。这座山是纽约附近山区卡德巴克维尔的一大片土地，那里建有与法轮功有关的寺庙——这又与早期的法轮功不同，法轮功声称它不是一种宗教，原因有多种，其中包括没有寺庙或礼拜场所。李花了很多时间在

那里监督住在那里的神韵舞者——主要是孩子和年轻人。相传，这座山是末世淘汰后，一批新弟子将前往学习法轮功的地方。

但威廉对几件事感到不安，这个故事很有趣，因为很难获得与隐居的李互动的真实描述。首先，李师傅正在喝一罐可乐。这对威廉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李一直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没有任何世俗执着和欲望的人，以至于他谈不上有趣，甚至连食物好吃不好吃都分不清。其次，威廉看到李以一种令他震惊的愤怒和激烈程度斥责年轻的舞者，这完全不符合李自己的教诲，即我们用同情心与人和彼此打交道。（李老师给澳大利亚学员讲课的视频，他们显然争论太多了，讲了很多关于互相慈悲的事情。他讲得格外平静，微笑着，

关于法轮功是否邪教的话题，其他人已经尝试过了，我就不多说了。这有点像脏话，对于大多数使用它的人来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但我要指出的是，法轮功是一个比许多人意识到的更加隐秘和控制的组织，它不是一个透明的组织。虽然大多数核心教义都可以在网站上免费访问，但也有一些秘密教义和指示是口头传递的，曾经向公众开放的讨论和论坛现在受到严格控制。李老师发表的讲座和最近的视频并不是原始演讲的简单转录，而是经过高度编辑和编辑的。所有法轮功网站，尤其是自称是修炼者论坛的明慧网，都经过严格策划。李老师已经明确表示，任何人未经他的同意，抄写、记录他的讲法并传播，都是破坏他的修炼，这是严重的罪过。他还猛烈批评了清心论坛等与法轮功相关的在线论坛，因为修炼者之间的对话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虽然从技术上讲，法轮功练习者可以自由出入，但除了与其他虔诚练习者的婚姻和孩子等社会联系外，社会压力和深刻的精神恐惧也成为强大的持久力量。许多人为法轮功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却与社会失去了联系，重新回归将是一个可怕的前景。然后，我深深地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你的朋友和家人承认，你谈论了这么久的事情有一个阴暗的一面，而你却只字不提。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写这篇文章。这是一个我还没有向任何人完整讲述过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法轮功群体不是这样的。但我害怕那些仍在这样做的朋友的评判，我害怕被我一直以来认识的不练习的人视为白痴。我不是一个愚蠢的人——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有一份很好的职业，并且通常对我周围的世界有细致入微的看法。这次经历暴露了我幼稚、天真的一面；理性和教条如何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并存。我很难向人们解释这一点。

但最重要的是，我深深地担心，如果正视我在法轮功中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我会在今生和来世面临难以想象的惩罚。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我，我想只有那些和我一样有着深厚精神信仰的人才能理解这一点。唯一一次我真正感到安全，免受我每天犯下的一长串罪恶的后果的影响，只需继续我的生活，就是当我坐下来冥想或阅读李的著作时。这是李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精心培育的一种血债，并定期提醒他们。

尽管我的妻子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但法轮功以及我离开法轮功时所感受到的困惑可能是结束我婚姻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正在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并从头开始重新塑造我的世界观。我不得不重新评估我所做的许多重大选择。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原来的生活，去海外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安静地做这件事。我放弃了一些关系并重新点燃了另一些关系。我听着我曾经喜欢的音乐，从事着我曾经热衷的事业，与我曾经亲近的人取得了联系。这就像重新连接到一条生命线或一个在我修炼法轮功时开始死亡的故事。

但这并不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在法轮功期间得到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体验冥想以及闭上眼睛坐着并让一切平静下来所带来的清晰和温暖。李不拥有这个。冥想让我感到感激、渺小，并有动力去挽救尽可能多的注意力来体验生活。你可以说我现在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了。它只有一名追随者，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有时我想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多年来以大师的身份出现的许多李洪志，或有魅力的推销员，或只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人们能够在实现目标时对一路上受到伤害的人（包括他们最坚定的信徒）置之不理。李的著作从热烈的奉承跃升为“严厉警告”，本质上是警告他的追随者，如果他们不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他们将面临永恒的诅咒。当他把它们交给他的追随者时，随之而来的恐惧和自责真的很痛苦。我想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相信自己的教义。如果他没有自欺欺人地相信他所宣扬的东西，那么他一定知道他所兜售的谬论有多大，而这将使他成为一个愤世嫉俗、令人讨厌的人。他完美的自信为那些与世界上的灰色阴影作斗争的人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区。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一个安全区。

很难解释，现在的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我相信如此疯狂的意识形态，而且持续了这么久。同样，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会放弃他们所知道和关心的一切，加入像伊斯兰国这样令人厌恶的组织。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所做的事情让我感到恶心。但我想我能体会到这些年轻人内心的想法：渴望清晰、寻找意义、渴望归属感、愿意为比他们更大的事业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这是

一个很容易卡住人的地方，而且可能非常危险。逻辑、教育、知识、人际关系——所有这些东西都从调节力量变成了推动事业的工具。

本文绝不是试图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荒谬和暴力的镇压辩护。中国政府对该组织的许多彻头彻尾的谎言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法轮功，为该组织提供了人权叙述，使其不必过于关注自己的做法和信仰。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坚持事实就好了。在许多外国人的心目中，法轮功与国外的其他自由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法轮功并不关心其他团体或中国的改革。在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的世界观中，除了法轮功的各种项目之外，任何试图在人间取得成果的运动都是在从事肮脏的人类政治。

不幸的是，许多无知的西方人对法轮功的同情导致了与许多中国人的一种愤怒的对峙，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法轮功简直是愚蠢的，西方人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中国。这种事情会造成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隔阂，在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气候下，这是我们最不需要的。

法轮功向公众及其追随者定义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注重健康、关心人权的精神团体——是不正确的。它让我变得不那么健康、不那么快乐、不那么善良、不那么富有同情心。这让我对自己和他人不再那么诚实。它曾经提供的任何精神成长都被抛在了路边，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关机器，用于胡说八道，剥削疲惫不堪的狂热者的自由劳动力。现在它的目标与冥想、灵性或改善健康无关。这只是一个政治机器——李的计划是为了积累权力和影响力，然后为他下一步想到的任何奇怪的目标而努力。

最后我把那个悲伤的小男人留在了尘埃里。我和李已经完成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我更改了本文中的所有名称。